

論文

乾隆上諭對《四庫全書》編纂的影響

黃瓊誼*

中文摘要

纂修《四庫全書》過程中，乾隆所下達之上諭，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總綱和最高指導原則。本文探討其上諭對《四庫全書》編輯工作、編輯內容主要之影響，從乾隆上諭中，展現出乾隆對《四庫全書》編纂的精心策劃，與投注了大量的關注。但乾隆上諭有時也帶來負面影響，對《四庫全書》的價值造成傷害，尤其是刪改、禁毀抵觸清朝之著作，最為後人詬病。然而在其上諭指示下所完成對《永樂大典》輯佚，以及《四庫全書總目》一些御敕書籍，則有其正面意義。此外，上諭仍有其侷限性，館臣未必一一貫徹乾隆之主張。

關鍵字：四庫全書 乾隆 上諭

一、前言

不同於宋太宗纂修《太平御覽》有斧聲燭影之嫌、明成祖纂修《永樂大典》有得位不正之譏，兩者皆有藉修書以弭朝野非議之用意，《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乃十全老人乾隆在文治上的代表作，目的在於「稽古右文，聿資治理」¹，代表著盛世修書的傳統。乾隆對該書之編纂相當重視且十分上心，也因此屢屢下旨關心、指導、裁示所有相關工作。自清乾隆六年(1741年)正月四日²、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四日³他兩度下詔徵採遺書，到安徽學政朱筠上摺響應並建請校核《永樂大典》⁴，以輯佚舊籍，算是編纂本書的醞釀期；其後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設置「四庫全書館」、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文淵閣《四庫全書》繕竣、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北四閣《四庫全書》完成⁵，算是編纂本書的完成期；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¹ 〈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

²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4，台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第三冊，頁2008。

³ 〈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前揭書，頁1。

⁴ 〈安徽學政朱筠奏陳購訪遺書及校核《永樂大典》意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20。

⁵ 至於南三閣確切完成時間尚待確認，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十四日內閣抄出十二

十九日⁶、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十八日⁷兩次下旨復校、嘉慶八年(1803年)十二月空函書籍繕竣⁸，算是編纂本書的善後收尾期。在每一階段的上諭中，都可看到乾隆對《四庫全書》編纂的關注、監控、指導、決策的身影，無論從徵書、選擇底本，到抄書、校書，包含了編纂目的、編纂體例、編纂校勘、編書取捨、古籍改編、文化傳播等範圍，乾隆都一一過問，親自安排⁹，展現出乾隆對《四庫全書》編纂的精心策劃，與投注了大量的關注。《四庫全書·凡例一》中提到乾隆指示編輯工作的情形：

是書卷帙浩博，為亙古所無。然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權衡獨運，褒貶斯昭，睿鑒高深，迥非諸臣管蠡之所及。隨時訓示，曠若發蒙，八載以來，不能一一殫記，謹錄歷次恭奉聖諭為一卷，載諸簡端，俾共知我皇上稽古右文，功媿刪述，懸諸日月，昭示方來，與歷代官修之本，泛稱御定者，迥不相同。¹⁰

其中雖不免有些溢美之詞，但「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隨時訓示，曠若發蒙，八載以來，不能一一殫記」，因此本書之完成，「與歷代官修之本，泛稱御定者，迥不相同」，確實也反映出乾隆對《四庫全書》編纂關注程度之深，與實際介入的影響力，自然會對《四庫全書》的編纂，產生許多指導與規範的作用。今試就乾隆上諭，探討其對《四庫全書》編輯工作及思想內容兩方面之影響於下。

日上諭稱「今續辦三分，全書已均告竣」(《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27)，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二十三日上諭則稱「所有江浙兩省，文宗、文匯、文瀾三閣應貯全書，現已陸續頒發藏庋……俟貯閣全書排架齊集後，諭令該省士子，有願讀中祕書者，許其呈明到閣抄閱」(《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189)，兩者所言完成時間不一。但前者所言，南三閣書似已抄繕完成，因逢乾隆下旨對《四庫全書》復校，因而延至五十五年方才準備開放。

⁶ 〈寄諭大阿哥永瑑等文淵文源所貯全書著派科甲出身尚書等校閱〉，《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05。

⁷ 〈諭內閣將文津閣全書內《揚子法言》空行交軍機大臣填補等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232-2233。

⁸ 〈軍機大臣慶桂等奏辦理文淵閣空函書籍告竣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385-2386。

⁹ 詳參戚福康：〈《四庫全書》乾隆御旨平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年6期，頁1-6、2002年2期，頁28-32。

¹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31。

二、對《四庫全書》編輯工作之影響

毫無疑問地，乾隆上諭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總綱和最高指導原則，所以館臣才稱：「此尤聖裁獨斷，義愜理精，非館臣所能仰贊一詞者矣」¹¹。舉凡書名之命名，「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¹²，以及決定編輯該書之體例不同於《永樂大典》之「原編體例係分韻類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難期貫串」¹³、「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¹⁴方式，也不同於其祖康熙所編纂之《古今圖書集成》乃「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¹⁵，有不能悉載全文之缺點，「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二法。是書既遺編淵海，若準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為有益」¹⁶，採取了四部分類之體例。至於各項編輯之工作，也都是在乾隆指揮、監控下進行，如諭旨中詳述徵書之作業辦法：

在坊肆者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兆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後，令廷臣檢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略，益昭美美備，稱朕意焉！¹⁷

而《四庫全書》館組織的設立，以及主要人員選派，則是乾隆透過指派、徵召、調任、協辦、自願等方式，匯集了三百六十位各類優秀人才從事纂修工作¹⁸。乾隆透過指揮總裁、副總裁、總纂官、總閱官、總校官等人，制訂各項工作章程、選拔優秀人才、進行考核催辦、審查思想內容、校勘謄寫書籍、

¹¹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 31。

¹² 〈大學士劉統勳等奏議定校核《永樂大典》條例並請撥房添員等事摺〉御批，《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60。

¹³ 〈諭著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校核《永樂大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55。

¹⁴ 〈諭內閣《永樂大典》體例未協著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為總裁官詳定條例分晰校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57。

¹⁵ 〈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

¹⁶ 〈諭內閣《永樂大典》體例未協著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為總裁官詳定條例分晰校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57。

¹⁷ 〈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

¹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二》，〈辦理《四庫全書》在事諸臣職名〉，前揭書，頁 15。

編寫提要等各項編輯工作：

現在查辦《四庫全書》之翰林官等，著照武英殿修書處之例，給與飯食，即交福隆安派員經理。¹⁹

現在辦理《四庫全書》卷冊浩繁，必須多派大臣，董司其事。劉統勳、劉綸、于敏中、福隆安、王際華、裘曰修俱為正總裁，英廉、慶桂外，并添派張若淮、曹秀先、李友崇為副總裁。²⁰

臣等恪遵諭旨，將應行條例，公同悉心逐一酌議，謹擬定十三條，另繕清單進呈，恭請訓示。俟發下，臣等即行遵照，作速辦理。²¹

至於工作人員的管理與獎懲，關係到這項宏偉的文化工程成敗，尤其工作人員之眾多與工作內容之繁複，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與獎懲措施，方能使編輯工作順利推行。從乾隆上諭中不難看出乾隆在管理上，對各項工作弊端都能掌握與杜絕防範，無論是對書籍管控以避免遺失--「不應聽纂修等攜帶外出……至館中設有提調人員稽查，攜書外出，若曾經告知提調，即當與之同科，或纂修私自攜歸，該提調亦難辭失察之咎……再，各省所解遺書，辦畢後仍須給還各家，屢經明降諭旨。恐纂修等亦有隨便取攜，以致遺失者……，致有舛失，惟該總裁是問」²²、誤抄--「自應悉心校繕，俾免魯魚亥豕之訛……其如何妥立章程，俾各盡心校錄，無訛之處，著總裁大臣詳議具奏」²³、誤校--「即原文傳寫舊訛或文義不順，既有加簽改識之例，何不逐條舉出，概以輕心掉之耶……，而疵謬疊出，該總裁等所司何事」²⁴、雇人代繕「嗣後此項議敘人員(案：自備資斧效力繕寫人員)，著照部議，彙齊五十名，奏請考試一次。惟是伊等寫書時，大率倩人代繕，其本人字畫未必悉

¹⁹ 〈諭著福隆安派員經理《四庫全書》處人員飯食〉，《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63。

²⁰ 〈諭著劉統勳等為《四庫全書》處正總裁張若淮等為副總裁〉，《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73。

²¹ 〈大學士劉統勳等奏議定校核《永樂大典》條例並請撥房添員等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59。

²² 〈諭著舒赫德查明遺失《永樂大典》實情並各省書籍毋許攜往私家〉，《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16-217。

²³ 〈諭內閣著總裁大臣詳議校錄《四庫全書》章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63-164。

²⁴ 〈諭內閣《四庫全書》處進呈各書疵謬疊出總裁蔡新等著交部察議〉，《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74-275。

能工楷……其有不到及倩人代作諸弊，仍著照部議嚴查」²⁵。及臣屬查奏曠廢職務--「內有謄錄姚歧謨一名，曠欠至數月之多」²⁶、冒名頂替--「查審李英賄買頂冒四庫館謄錄蔣翰一案」²⁷等弊端，乾隆都下旨加以嚴懲、嚴辦。

編纂《四庫全書》首先要廣徵天下遺書，乾隆自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四日下旨徵書，「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稽古右文之盛」²⁸，令各地督撫、學政盡速辦妥。但因之前屢次文字獄陰影猶在，故而臣民頗存觀望疑慮之心。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八日，遂再次下詔，一方面要消除臣民心中疑慮，一方面則威逼臣民就範：

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藏書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諭後，仍似從前疑畏，不肯將所藏書名開報，聽地方官購借，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書，則是其人有意處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著再傳諭各督撫等，予以半年之限，即遵朕旨，實力速為妥辦……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將此一併通諭中外知之。²⁹

在嚴懲的威逼之外，乾隆也不忘誘之以名利的獎勵。除了「在場肆者或量為給價」³⁰，也有督撫倍價購買³¹以求表現。乾隆又以賞內府善本之書³²、親自題詠簡端³³、載名各書提要之末³⁴等獎勵獻書辦法，遂掀起一波波獻書的熱潮。

²⁵ 〈諭嗣後四庫館效力年滿議敘人員著嚴加考試分別核辦〉，《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1000。

²⁶ 〈戶部尚書王際華奏謄錄姚歧謨曠課數月分校鄭熾等不查報請交部議處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224。

²⁷ 〈江蘇巡撫楊魁奏拿獲說合頂買謄錄之儲曾英解交刑部審辨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1058。

²⁸ 〈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1。

²⁹ 〈諭內閣傳令各督撫予限半年迅速購訪遺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68-69。

³⁰ 〈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2。

³¹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初四日，江西巡撫海成奏摺稱「前經奏請展限倍價購買以來」之語。〈江西巡撫海成奏續獲應燬書籍板片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548。

³²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十四日上諭「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為數至五、六、七百種……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又進書一百種以上……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諭內閣賞鮑士恭等《古今圖書集成》周厚堉等《佩文韻府》各一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211)。

³³ 「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評詠，題識簡端」(〈諭內閣賞鮑士恭等《古今圖書集成》周厚堉等《佩文韻府》各一部〉，《纂修四庫

徵書之後的繕寫工作，臣工也訂有明確的規定來督導人員謄寫，不僅要求每人每日字數工作量--「每人每日寫一千字，每年扣去三十日，為赴公所領書交書之暇。計每人每年可寫三十三萬字，並請照各館五年議敘之例，核其寫字多少以為等差。如五年期滿，所寫字能逾十分之三以上者，列為頭等，准咨部議敘。其僅足字數者，次之。若寫不足數，必須補寫完足，方准咨部」³⁵，還「又有限滿時字數雖符，而核其平日字蹟訛脫記過多者，酌量再留一二年，方准咨部議敘，以示懲儆」³⁶、「謄錄所交之書，校對時有應駁換者，仍駁回換寫。其訛錯多者，並須記過總核，於議敘時分別勸懲」³⁷，兼顧抄錄的品質，能達到字體工整、繕寫無誤的要求，工作人員期滿才得以報部議敘。這些工作規定，得到乾隆首肯而實施。

繕寫之後的校對工作，也是《四庫全書》編纂成敗的重要關鍵，臣工也有「現在辦書大局，非繕寫之難，而校對之為難」³⁸的體認，因此訂有明確而周密的獎懲措施〈功過處分條例〉，「嚴核功過以示勸懲也……，設功過簿，以專責成也」³⁹，來督導人員校對工作，透過分校、複校、總校、總裁四級分層校對，以維持《四庫全書》編纂的品質，得到乾隆「所議甚好。依議。」⁴⁰首肯而實施。乾隆還責成諸總裁「專司考核督催」⁴¹、軍機處負責查核訛誤、吏部負責議處，定期奏聞：

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11)。

³⁴「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古之家，應即將其姓名附載于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于後」(〈論內閣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將藏書人姓名附載于各書提要末並另編《簡明書目》〉，《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29)。

³⁵〈辦理《四庫全書》處奏遵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宜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77-78。

³⁶〈多羅質郡王永瑑等奏戈源請將謄錄計字議敘應毋庸議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377。

³⁷〈多羅質郡王永瑑等奏戈源請將謄錄計字議敘應毋庸議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379。

³⁸〈多羅質郡王永瑑等奏戈源請將謄錄計字議敘應毋庸議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379。

³⁹〈多羅質郡王永瑑等奏議添派覆校官及功過處分條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69-170。

⁴⁰〈多羅質郡王永瑑等奏議添派覆校官及功過處分條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69。

⁴¹〈諭著四庫館總裁福隆安等專司考核督催以期迅速蒞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013。

著自今年正月起，所有進過書籍訛錯之處，交軍機大臣通行查核。經朕看出錯訛者，其分校覆校名下，錯至兩次，總裁名下所校，錯至三次者，均著查明，奏請交部議處……此後著交軍機大臣照此，每三月一次，查辦奏聞。⁴²

並且還釐清應負責任之歸屬，「請此後總裁等於每十本內抽閱二本，黏貼總裁名簽，其未經抽閱者，於書面黏貼總校名銜，如有錯誤，各無可諉」⁴³，如此一來，就職責明確，便於管理。從處分的資料看來，乾隆為責成總裁盡心負責，處分尤重於僚屬，雖皇子貴胄亦不免：

但校勘載籍與部院衙門辦事不同……但庶僚議處轉重於大員，於情事未為平允。嗣後總裁應議者，仍令罰俸半年；其總校、覆校、分校各員應議者，止須罰俸三月。⁴⁴

前派八阿哥、十一阿哥、校勘四庫全書。向來總裁校書，經朕指出錯誤者，例有處分。嗣後阿哥等所校之書，如有錯誤，亦應一體查核處分，以昭公當。其應罰之俸，著照尚書例議罰，即於應得分例內坐扣。⁴⁵

在求好心切下，乾隆於《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後，還兩次下旨，進行大規模的複校，使《四庫全書》的品質大幅提升更趨完善。第一次在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乾隆因翻閱文津閣所貯《四庫全書》發現其中訛謬甚多，推想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其訛舛處所，亦皆不一而足，因而下令進行複校。在諭旨中，詳細規定了複校地點、複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量、工作人員負責事項，更對原辦之官員、謄錄，加以究責，展現出他對複校工作的重視：

著派科甲出身之尚書、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屬等官，分司校閱。其尚書，侍郎管理事務繁多者，每日每人著各看書一匣；大阿哥、八阿哥及事簡之堂官，各看書二匣；京堂、翰、詹、科、道、部屬等官，每人每日各看書二匣……其文淵閣書籍，著在文華殿、內

⁴² 〈諭內閣所有進過書籍訛錯之處著軍機大臣每三月查核一次奏請交部議處〉，《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576。

⁴³ 〈諭內閣嗣後四庫館校閱各書著照程景伊所奏章程辦理〉，《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757。

⁴⁴ 〈諭嗣後總裁應議者仍令罰俸半年總校等止須罰俸三月〉，《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640。

⁴⁵ 〈諭內閣嗣後阿哥等校書錯誤亦應一體查核處分〉，《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806。

閣等處閱看，文淵閣書籍著在圓明園朝房閱看。內中天文、推算等書交欽天監堂司各官專看；樂律等書交樂部專看；醫藥等書交太醫院官員專看。文淵閣書著大阿哥、阿桂專司收發，其挖改換頁等事，即交彭元瑞、金簡管理；文淵閣書著伊齡阿、巴寧阿專司收發，其挖改換頁等事，著八阿哥、劉墉專管……仍查明原辦總纂、總校、提調、校對各員，分別治罪，並將業經議敘已登仕版之該謄錄亦予斥革，俾甄敘不得濫邀，而藏書益臻完善。⁴⁶

其後又在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因翻閱文津閣所貯《四庫全書》之《揚子法言》，發現漏寫事項，故而乾隆龍顏大怒，再次諭令原參與編輯官員進行大規模複校工作。犯錯的相關官員不僅遭受吏部嚴加議處，如：「紀昀並未留心補入，更屬疏忽。紀昀及詳校官莊通敏，俱著交部分別議處」⁴⁷，還有遭到賠款的懲罰--「著將文淵、文源、文津三閣書籍所有應行換寫篇頁，其裝訂挖改各工價，均令紀昀、陸錫熊二人一體分賠……現在續辦三分書應發文淵、文匯、文宗三閣陳設者……所有面頁裝訂木匣刻字等項，俱著陸費墀自出己貲，仿照文淵等三閣式樣罰賠」⁴⁸，以及罰看書的處分--「查奉旨罰來熱河看書各員」⁴⁹、「其原辦各員，在京供職者俱罰令赴熱河看書，外任各員按照錯誤次數議罰養廉，在籍各員於補官日議罰廉俸，其現出學差人員，遵旨俟差竣後同陸錫熊前赴盛京看書」⁵⁰。其中原總校官陸費墀獲咎尤重，不僅需獨力負責江南三閣賠寫款項，又被革任⁵¹，身歿還遭到抄沒家產的處分⁵²。而原總纂官陸錫熊，則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在前往關外文溯閣複校的途

⁴⁶ 〈寄諭大阿哥永瑑等文淵文源所貯全書著派科甲出身尚書等校閱〉，《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05-2006。

⁴⁷ 〈諭內閣將文津閣全書內《揚子法言》空行交軍機大臣填補等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233。

⁴⁸ 〈諭內閣將文淵等三閣書籍應換寫篇頁及工價令紀昀陸錫熊分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26-2027。

⁴⁹ 〈禮部尚書紀昀奏參朱鈐等四員尚未到熱河校書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94。

⁵⁰ 〈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遵議紀昀查勘熱河書籍分別辦理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119。

⁵¹ 〈諭陸費墀革任之處著註冊等議處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59。

⁵² 「現在陸費墀業已身故，所有插架、裝匣等事……並著海寧查明陸費墀原籍現有田房產業，加恩酌留一千兩之數，為伊家屬養贍，如尚有餘資，即作為添補三閣辦書之用」，〈寄諭浙江巡撫海寧等仿照前次發去裝潢書匣等式樣製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205。

中，病逝於途。兩次複校之後，主要負責人原總纂官紀昀奏稱：「各該員俱感激悚惶，認真搜剔，臣亦往來巡察，不時抽看。計所簽舛漏，較初次詳校竟增數倍之多，凡一字、半字之空白，悉皆檢出，各調取底本補填。其餘卷頁脫落、行款參差以及流水錯誤者，亦俱抽換修整」⁵³，校出錯誤達先前數倍之多，足見乾隆諭令進行複校工作，對《四庫全書》品質之提升，確實大有幫助。

對《四庫全書》完成後的庋藏問題，乾隆也甚為關注。早在編纂《四庫全書》初期即已思考籌劃成書後的保存與庋藏，「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⁵⁴，他選擇浙江寧波府范懋柱家所建之天一閣藏書房屋、書架造作之法，作為《四庫全書》七閣建造規制：

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并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成准樣，開明丈尺呈覽……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倣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⁵⁵

范氏天一閣不僅影響了《四庫全書》七閣建造規制，「閣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閣」⁵⁶，還影響了北四閣的命名「四閣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澗，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為」⁵⁷。而七閣建成後的管理機制、人員工作職責等事項，乾隆也一一加以規劃：

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衙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⁵⁸

⁵³ 〈左都御史紀昀奏文源閣書覆勘先完請將詳校官等分別議處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237-2238。

⁵⁴ 愛新覺羅·弘曆：〈文淵閣記〉，《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721。

⁵⁵ 〈諭著杭州織造寅著親往寧波詢察天一閣房間書架具樣呈覽〉，《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12。

⁵⁶ 愛新覺羅·弘曆：〈文淵閣記〉，《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721。

⁵⁷ 愛新覺羅·弘曆：〈文淵閣記〉，《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724。

⁵⁸ 〈諭內閣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議定文淵閣官制及赴閣觀覽章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518。

即著交提舉閣事一人專為管理，其領閣、直閣、校理、檢閱等官，俱作為兼充虛銜，不必辦理本閣事務……，嗣後止須慎為珍藏，竟可毋庸曝曬，其地面一切，亦無須奉宸苑經理，庶專司有人，而藏書倍為完善。⁵⁹

乾隆甚至連書成後之函套製作、封面分色都考慮到，「至書冊分四色裝訂，檢閱既便，散貯亦堪經久，不必更加外函以免漿氣致蠹」⁶⁰，足見他對《四庫全書》度藏問題上的用心，雖枝微末節也不輕忽。

三、對《四庫全書》編輯內容之影響

乾隆除了對《四庫全書》編輯工作有所影響外，他對《四庫全書》編輯內容最重大的影響，則是在於編輯書籍的收錄、取捨上，其標準主要是依據乾隆自身好惡、有利清廷統治權這兩項因素來決定。採取的手段則有不收、刪改、禁毀等方法，直接影響到《四庫全書》文化上的價值，也引發了《四庫全書》是非功過的爭論。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四日所下之徵書上諭中，即已依據個人喜惡，規劃出收錄書籍大致的範圍：

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適嫁名馳騫，編刻酬倡詩文，瑣碎無當者，均毋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有成編，並非勦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⁶¹

其後他對《永樂大典》收錄內容的不滿，也限定了《四庫全書》排除釋典、道經兩類中華文化重要思想典籍之收錄，因此招致全書不全之憾：

甚至載入六書篆隸真草字樣，摭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描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外，闖入釋典、道經，於古柱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為鑿納不合。⁶²

⁵⁹〈諭內閣文淵閣著交提舉閣事一人專管並全書嗣後毋庸曝曬〉，《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142。

⁶⁰〈辦理《四庫全書》處奏遵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宜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78。後來則改採楠木製作書籍函套，以防蟲蠹。

⁶¹〈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2。沈德潛後因涉及徐述夔詩案，著作亦遭屏斥。

⁶²〈諭內閣《永樂大典》體例未協著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為總裁官詳定條例分晰校核〉，《纂

蓋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⁶³

至於作家、作品收錄的標準，從乾隆上諭中可以歸納出「釐正詩體，崇尚雅醇」⁶⁴、「聖朝彰善癉惡」⁶⁵這兩點，如此標準是乾隆希望藉由「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⁶⁶，達到「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的目的。所以為乾隆所不喜的青詞、香奩體這類作品，盡遭摒除：

昨閱四庫館進呈書，有朱存孝編輯《回文文類聚補遺》一種，內載〈美人八詠〉詩，詞意蝶狎，有乖雅正……，自《玉臺新詠》以後，唐人韓偓輩，務作綺麗之詞，號為香奩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為卑下……。朕輯《四庫全書》當采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奩概行采錄。所有〈美人八詠〉詩，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著該總裁督同總校、分校等詳細檢查，一並撤出，以示朕釐正詩體，崇尚雅醇之至意。欽此。⁶⁷

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片各書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必不肯為，即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托神靈，遊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為之，固屬無害……，再所進書內……，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律從刪……，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羣言悉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欽此。⁶⁸

因此劉跂的《學易集》不僅刪去達三分之一，僅剩 8 卷，而其餘有類似情形如宋朝王珪者，也比照辦理，同遭刪芟之禍，凡此之例甚多，這是乾隆以一己之意，造成《四庫全書》不全之弊：

《永樂大典》載跂詩文頗多，雖未免有所脫佚，而掇拾排次，尚可得

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57。

⁶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 34。

⁶⁴ 〈諭內閣所有《美人八詠》詩並似此者一併從全書撤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433。

⁶⁵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 33。

⁶⁶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 33。

⁶⁷ 〈諭內閣所有《美人八詠》詩並似此者一併從全書撤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433。

⁶⁸ 〈諭內閣《學易集》等有青詞一體跡涉異端抄本姑存刊刻從刪〉，《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473。

什之六七。謹依類編訂，共錄為十有二卷。今恭承聖訓，於刊刻時削去青詞，以歸雅正……，皆跡涉異端，與青詞相類，亦概為削除，重加編次，釐為八卷。用昭鑑古斥邪之訓，垂萬世立言之準焉。⁶⁹

其中有青詞、密詞、道場文、齋文、樂語之類，雖屬當時沿用之體，而究非文章正軌，不可為訓。今以原集所有姑附存之，而刊本則概加刪削焉。⁷⁰

此外還有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也是因乾隆好惡而遭致斥入存目，不予收錄者：

其倚聲填調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臣等初以相傳舊本，姑為錄存，並蒙皇上指示，命從屏斥，仰見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是以編輯雖富，而謹持繩墨，去取不敢不嚴。⁷¹

又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於唐以前偽書大率著錄，這是因為唐以前之書，流傳至今者寡，就其幸存者，雖或無關於經訓，然而片詞隻字，皆可做為詞章考據之用。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中，對此有做一說明：

其有本屬偽書，流傳已久，或掇拾殘剩，真贋相參，歷代詞人已引為故實，未可概為捐棄，則姑錄存而辨別之。大抵灼為原帙者，則題曰某代某人撰；灼為贋造者，則題曰舊本，題某代某人撰。⁷²

然而《燕丹子》、陶潛《聖賢群輔錄》兩書，卻因為乾隆的指示，一為「其他多鄙誕不可信，殊無足採，謹仰遵聖訓，附存其目」⁷³；一則是「蒙睿鑒高深，斷為偽托」⁷⁴，都是「經聖鑒洞燭其妄者，則亦斥而存目，不使濫登」⁷⁵，實際上也是乾隆對編輯體例的破壞，乾隆的指導變成了干擾，也難怪館臣在凡例中要特別標舉說明之。就字面上看來，讓乾隆有「蒙睿鑒高深」、「洞燭其妄者」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滿足了乾隆的虛榮心；換個角度看，未嘗不是畫清文責之舉。

至於乾隆彰善癉惡的標準，也深深影響到《四庫全書》收錄作品的標準。

⁶⁹ 〈學易集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55，前揭書，頁 2080。

⁷⁰ 〈華陽集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52，前揭書，頁 2046。

⁷¹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 33。

⁷²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 33-34。

⁷³ 〈燕丹子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43，前揭書，頁 1887。

⁷⁴ 〈聖賢群輔錄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37，前揭書，頁 1779。

⁷⁵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 34。

凡例中對品評作家、作品的標準已有文學獨立品評的趨向，「文章德行，自孔門既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將人品、詩品分而觀之，因此一些乾隆特別提出的人物，如「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的姚廣孝、嚴嵩；才大學博，主持東南壇坫的錢謙益、格調派領袖沈德潛之輩，不論其文學、文學批評上的成就如何，一概斥入存目，「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准千秋之公論」：

文章德行，自孔門既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今所錄者，如龔詡、楊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其書。耿南仲之說《易》，吳玕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類，略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至於姚廣孝之《逃虛子集》、嚴嵩之《鈐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則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非止微瑕。凡茲之流，並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准千秋之公論焉。⁷⁶

除了乾隆上諭外，紀昀在〈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中也將乾隆指示摒斥者，如「立言乖體」四明學派之說、被乾隆斷為偽作的陶潛《聖賢群輔錄》、釋藏、道藏、申韓之術、嚴嵩、朱存孝《回文文類聚補遺》、張小山、韓偓、石孝友等著作，一一列舉出來，這些都說明了乾隆上諭對《四庫全書》收錄作品的影響：

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贗古誣真，五柳之名宜辨。七籤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蠹九奸，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詞；巧謝璇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豔曲，削香奩脂盞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聖主之品題，立分白黑。⁷⁷

比起不予收錄的處理方式，乾隆刪改與禁毀書籍的上諭，更為後人所詬病。編纂《四庫全書》之初，對書籍處理方式僅有應刊、應抄、存目三種方式，但當廣徵遺書之後，卻發現甚多詆毀清朝之作，引發乾隆刪改與禁毀書籍之舉。也有人認為乾隆早蓄「寓禁於徵」之意，只不過等引蛇出洞後再予執行。在廣徵天下遺書進行三年多後，自稱「朕辦事光明正大」的乾隆，面對許多「抵觸本朝」的著作，終於在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十六日上諭中，詳述對違礙書籍之處理方式：

⁷⁶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前揭書，頁33。

⁷⁷ 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16。

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遍為採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列。節經各督撫呈進，並飭館臣詳悉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閱，覺有不可不為區別甄核者。⁷⁸

乾隆區別甄核的標準，一為貳臣、不能死節之遺臣，卻又有詆毀清朝之言，應盡為銷燬：

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覲顏苟活，乃托名勝國，妄肆狂狷，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⁷⁹

二為改易違礙字句，如劉宗周、黃道周、熊廷弼、王允成、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明季忠臣之作，與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只需改酌一、二語，無庸銷燬：

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蓋溢于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為朝議所撓，至使身陷大辟。嘗閱其疏內，有「洒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為邊塞」一語，親為批識云：「觀至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又如葉向高……，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並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只須改酌一、二語，實不忍並從焚棄，致令湮沒不彰……，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為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見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⁸⁰

⁷⁸〈諭內閣明人劉宗周等書集只須刪改無庸銷燬〉，《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552。

⁷⁹同上注。

⁸⁰同上注。

三為刪削，「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眾」。乾隆希望透過這三種處理原則，使無礙之書，照舊流行；應禁之書，無法藏匿：

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眾。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祇須刪去數卷，或刪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刪，涉於詆詈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燬。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藏匿，方為盡善。⁸¹

其後又對一些個案下達修正指示，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十四日對《宗澤集》、《楊繼盛集》等書中「夷」、「狄」二字，館臣改為「彝」、「敵」，以「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為非理……，除此二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者，並著一體查明改正」⁸²。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二十六日對徐必達、蕭近高、宋一韓、侯震暘等明人文集中違礙字句，以其人等，忠蓋之忱，溢於簡牘，乃下旨酌量改易，毋庸銷燬：

況諸臣彈劾權奸，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章疏，不盡見於《明史》。朕方欲闡幽微顯，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況諸臣在勝國言事，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彼自為其主，不宜深責，非若身入本朝、肆為詆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應存諸疏，將觸背字面略為改易選錄，餘仍分別撤燬，於辦理違礙書籍，亦屬並行不悖。⁸³

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七月二十七日，乾脆下旨對明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做一通盤處理，若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裒集成《明名臣奏議》，並將先前紀昀等所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編成的《明季奏疏》，歸入此書：

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即有違

⁸¹同上注。

⁸²〈諭內閣《宗澤集》等書內「夷」、「狄」二字母庸改易並將其總裁等交部分別議處〉，《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751-752。

⁸³〈諭內閣著將明人違礙書籍內匡救時艱諸疏選擇編為《明季奏疏》〉，《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1006-1007。

礙字句，祇須略為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驚心……，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⁸⁴

乾隆刪改與禁燬書籍的作法，使大量書籍失真、失傳，大大地減低《四庫全書》文化上的價值。據黃愛平統計，禁燬書籍達三千一百多種，銷燬書版達八萬多塊以上⁸⁵，無怪乎蕭一山稱「世或比之于秦皇之焚書云」⁸⁶、任松如稱「雖其工程之大，著錄之富，足與長城、運河方架，迄不能償其罪也」⁸⁷，這些都是在乾隆指示下，所造成《四庫全書》最大的敗筆，身為決策者的乾隆，實在是難辭其咎。

三、結語

由乾隆上諭的觀察得知，乾隆意旨確實對《四庫全書》的編纂產生了指導與規範的作用，但這種「欽定」的影響有好有壞，也有其侷限性，今分述如下。

一就校書而言，規模達三萬六千餘冊《四庫全書》，雖經乾隆不斷要求文字的正确性，避免魯魚亥豕之誤，但經過兩次大規模的複校，甚至記過處分之眾與重⁸⁸，仍不免有「重鈔庫本訛奪滿紙」⁸⁹之議。這其中有如周輝所言：「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⁹⁰的因素在，正是說明校書之難。但乾隆急欲早日成書的壓力，也是造成《四庫全書》品質降低原因之一。《四庫全書》開館時，乾隆已是年高 63 歲，因此在輯佚《永樂大典》作業的上諭中，屢見急欲成其

⁸⁴〈諭內閣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為總裁纂輯《明名臣奏議》〉，《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1429。

⁸⁵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78。

⁸⁶蕭一山：《清代通史·乾隆之鼎盛及嘉慶之中衰》第二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59。

⁸⁷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序》，天津：古籍書店，1991 年，頁 2。

⁸⁸楊家駱：《四庫大辭典》，收有〈四庫館職員記過統計表〉，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印行，1991 年，頁 1937-1945。其中貴胄如八阿哥、十一阿哥；達官如蔡新、王杰；碩儒如王念孫、紀昀等 283 人之眾，皆遭記過處分。又如王燕緒在乾隆四十七年，記過共達 1797 次之重。

⁸⁹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台北：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230-231。

⁹⁰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334。

事之語，「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稽，汗青無日」⁹¹、「是書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歲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係棄多取少，自當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誚汗青無日」⁹²，急切之情，溢於言表。後惟恐不得躬睹《四庫全書》之完成，遂轉生濃縮全書之構想，於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一日諭令編修《四庫全書薈要》：「著於全書中擷取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庶縹緲羅列，得以隨時流覽，更足資好古敏求之益」⁹³。幸而乾隆壽長，能睹兩書之告成，因此「適觀厥成，實堪喜慰」，在第一份《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完成時，乾隆自述其心境，「望七之歲」、「時略嫌遲」，點出了乾隆當時內心的急迫感，相信館臣應該也能感受到乾隆急欲速成的壓力，在趕工的壓力下，不免降低了《四庫全書》校勘的品質：

癸巳歲(乾隆三十八年)，始思及依經史子集為《四庫全書》，並命輯《永樂大典》中散篇成帙，然朕臨御已三十餘年，亦望七之歲矣，斯事體大而物博，時略嫌遲。故甲午(乾隆三十九年)聯句詩有：「逢會略嫌遲歲月，就將惟壘願觀成」之句，今壬寅(乾隆四十七年)甫及十年，薈要兩部及全書第一部均已蒞事，裝潢貯閣，適當春仲經筵錫宴行慶，適觀厥成，實堪喜慰爾。⁹⁴

其次，乾隆刪改、銷燬違礙著作之舉，固然令人扼腕，但陳寅恪在〈重刻元西域華人化考序〉中指出：「然清室所最忌諱者，不過東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數十年間之載記耳」⁹⁵，乾隆所禁燬的書籍幾乎都是晚明清初這一時期的書籍。但在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御敕編修的副產品，如《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熱河志》、《河源紀略》、《歷代職官表》、《四庫全書考證》……等，無不具有高度學術價值。以乾隆下旨編修的《四庫全

⁹¹〈諭著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校核《永樂大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55。

⁹²〈諭內閣《永樂大典》體例未協著添派王際華裘日修為總裁官詳定條例分晰校核〉，《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58。

⁹³〈諭內閣編《四庫全書薈要》著于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108。

⁹⁴愛新覺羅·弘曆：〈經筵畢文淵閣賜宴以《四庫全書》第一部告成度閣內幸翰林院例得近體四律首章即疊去歲詩韻〉，《御製詩四集》卷八十七，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頁10-11。收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8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76年)。

⁹⁵收入《勵耘書屋叢刻》，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頁1。

書總目》而言，向來被學者視為治學之指南⁹⁶，其學術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算是上諭英明指導之功。此外，因為乾隆接受安徽學政朱筠輯錄《永樂大典》遺書之建議⁹⁷，館臣所得甚為豐碩，校輯出 491 種佚書、可校補存書 27 種⁹⁸。乾隆下旨輯佚此舉之功，正如朱筠所說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⁹⁹，似可稍稍彌補其刪改、銷燬違礙著作之過，梁啟超對此評論道：

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墜，則國民之遺產損焉。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采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最錄。其取材則唐宋間數種大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最多，而諸經註疏及他書，凡可搜者無不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不備舉。而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三部，集所輯至數百種，他可推矣。遂使《漢志》諸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累累現於吾輩之藏書目錄中，雖復片鱗碎羽，而受賜則既多矣。¹⁰⁰

再則，乾隆上諭對編纂《四庫全書》的影響也有其侷限性，館臣未必一一貫徹執行。以青詞而言，乾隆認為「非斯文正軌……，跡涉異端……，尤

⁹⁶如張之洞《輶軒語·語學》卷一：「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宏矣」、「夫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柳子厚好讀《國語》，乃能作《非國語》，蓋必與之相習，然後得其要害也。余之略知學問門徑，實受《提要》之賜，逮至用力之久，遂倚摭利病而為書，習慣使然，無足怪者」；王運熙《古典文學文獻及其檢索·序》：「《四庫提要》對我是一位最好的老師，它教給我的東西，比過去學校中任何一位老師教給我的還要多」。

⁹⁷〈安徽學政朱筠奏陳購訪遺書及校核《永樂大典》意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

⁹⁸顧力仁：《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台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5 年，頁 294。關於輯佚書數量，各家統計數目不同，如清人孫馮翼《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書目》統計得 516 種，清人繆荃孫《永樂大典考》得 417 種。

⁹⁹〈安徽學政朱筠奏陳購訪遺書及校核《永樂大典》意見摺〉，《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前揭書，頁 20。

¹⁰⁰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98-99。

乖典則者乎……，並當一律從刪」，乾隆厭惡的理由是：「跡涉異端」，因而見斥。異端是相較於正統的儒學而言，故而往往也包含一些釋、道宗教活動的作品被刪除，所以在《四庫全書》中，若有收錄這類「跡涉異端」、「語涉異教」的作者，理當一體照辦，一律刪芟。但是以葛勝仲《丹陽集》為例，卷九、十之中卻有多篇「跡涉異端」、「語涉異教」的作品，仍是加以著錄。這並非一時的失察而未加以刪除，從該書的書前提要稱「惟青詞、功德疏、教坊致語之類，沿宋人陋例，一概濫載於集中，殊乖文體，今凜遵聖訓，並從刪削，庶益為全美云」，到紀昀「一手刪定」¹⁰¹的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改稱「沿宋人陋例，一概濫載於集中，殊乖文體，流傳既久，姑仍其舊，付諸無識之列矣」¹⁰²，就可以知道這是有意為之，也是館臣並未遵照乾隆旨意之一例。其他之例甚多¹⁰³，要言之，即除乾隆欽點者外，去取標準，館臣並未全部一體照辦。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對作家、作品的品評，就不見得全以乾隆好惡為品評之準則，畢竟身為大清盛世的統治者，乾隆在日理萬機之餘，真的有时间、精力去關注到《四庫全書》編纂的所有細節嗎？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10231種的提要，二百卷的份量就讓他難以卒讀，因此他才會下旨編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但就算是《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數份量已縮減至十分之一，還是讓他發出：「簡明目錄從頭閱，向若已驚徒眈洋」的感嘆，且在詩後自注：「向因編輯全書總目提要，卷帙甚繁，令紀昀別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以便繙閱，然已多至二十卷，檢查亦殊不易」¹⁰⁴。在乾隆無暇遍查的情況下，自然會有異於乾隆意見存在的空間，這是乾隆上諭對編纂《四庫全書》的侷限性。因此，所謂的「欽定」，並不如想像中有那樣至高無上的影響力。

¹⁰¹朱珪：〈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文達紀公昀墓誌銘〉，錢儀吉纂：《碑傳集》卷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090。

¹⁰²〈丹陽集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56，前揭書，頁2093。這或許是紀昀敬重葛勝仲所致，如該提要中紀昀即盛讚葛勝仲「其氣節甚偉。歷典諸州，皆有幹略。再知湖州，遭逢寇亂，復有全城之功。其宦績亦足以自傳，本不盡以文章重。即以文章論之，在南、北宋間亦裒然一作者也」，是以有意保全其著作。

¹⁰³筆者曾撰有〈《四庫全書總目》對乾隆旨意依違之例--以集部為考察中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121期，2011年10月，頁26-51，可詳參之。

¹⁰⁴愛新覺羅·弘曆：〈題文津閣〉，《御製詩五集》卷67，頁1，收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10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76年）。